



▲仁济医馆募捐册

►《申报》1872年10月5日刊登仁济医馆之“聊以申谢”的广告
(照片均为作者提供)

聊以申謝
且世間善事頗多行善之人亦復不少惟人之行善其居心各有不同有以行善而自炫財富者亦有行善而圖博美名者且有行善而心存望報者皆行善而求人知之者也至行善不求人知則既非望報又不圖名且不至報其居心實超乎他人萬倍上矣故曰善人知便居善此之謂也昨本醫館蒙中國善士由滬發洋行轉送洋銀二百五十元以濟本館諸用並蒙姓氏里居本館實深感謝且正值目下來館就醫者日多一日房屋不敷居住添造數椽以補不足此項之來殊得用惜本館未獲識。荆一圖面謝謹誌數語代本館之身受嘉惠者一申聊結之意云一念鴻施未肯輕留夫姓字千祥聯集定徵貽福于兒孫
同治十一年九月初三日
仁濟醫館謹謝 甲 〇八

人知之者也。至行善不求人知，則既非賣富又不圖名且不望報，其居心實超他人萬倍上矣。故曰，善恐人各便是真善。此之謂也。昨本医馆蒙中国善士，由顺发洋行转送洋银二百五十元，以济本馆诸用，并无姓氏里居。本馆实深感谢，且正值目下来馆就医者日多一日，房屋不敷居住，添造数椽，以补不足。此项之来，殊得用惜，本馆未获识。荆一图面谢谨。志数语代本馆之身受嘉惠者，一申御结之意云，一念鸿施未肯轻留夫姓字，千祥联集定徵貽福于儿孙——同治十一年九月初三日，仁济医馆谨谢。

这份广告充分诠释了仁济医馆的行善价值观，批评社会中有目的、怀功利的伪善行为，树立仁济医馆正面行善、无欲无求、简单干净的近代意义的价值观和行善理念。该广告所传播出的三点信息：一、行善是不能求名求利求回报；二、仁济医馆正在募捐造新院；三、凡捐款给仁济医馆可获名利，仁济是不会让无名者默默无闻的。这份谢告在《申报》反复刊登，延续数月，这是仁济医馆通过媒体向其行善贵人所作的回报。在加深公众影响的同时，传播新型的慈善观念，一次次地为仁济医馆的捐募做广告，真可谓一石三鸟。

1873年8月仁济医馆移居改造，由《申报》刊布信息：

仁济医馆现移四马路西首，吴豪宅张宝源酒店南面。因其馆须改造故。……因就医者栖息，故欲改造而扩充之。可见中西医生艺术之精，存心之厚，不愧仁济之名矣。恐其移居他处而就医者难以问津，本馆爱代为布闻，愿阅《申报》者，更互相流传，不致病者无从寻觅。未始非与人为善之助云。

1876年仁济医馆在《教会新报》发布“上海仁济医院劝捐启”：

惟近来就医愈众，经费愈繁，众力博施，良非易事。望仁人君子，各发善心，利济为怀，同劝善举，官既捐俸，商亦捐金，同协中外之心，以泯生成之憾，如蒙慨助，请列衔名。

仁济医馆通过媒体反复高调倡导的医院行善观念和医院经营理念，终有回应。1887年《申报》在讨论医院筹建的核心问题“论医院宜筹，经久扩充之法”，作者以仁济医馆为例，“西医善堂，必先筹一笔款子，让其生利，然后岁负岁可用之”。光绪二十七年(1901)苏松太道蔡钧调任，山西巡抚岑春为其奏请嘉赏，其中一条便是，“在苏松太道任内，捐助仁济医院专建北庇寒所，地方均感其惠”。

(下转10版) ➔

◀ (上接8版)

局为上海及邻近地区的孩童种牛痘，同时他还编写种痘事项，印发传单给上海居民，说明(1)牛痘比中国传统人痘简易安全有效；(2)孩童种痘后的护理注意事项；(3)上海道台鼓励种痘的措施：“道宪爱民如子，体恤情殷，凡种痘日给钱一百文买物助浆，第八日复看，再给钱二百文为调养之费。”这项历时几十年的工作，黄春甫分文不取，完全是义务性工作。1877年，英界工部局在《申报》刊登《召种牛痘示》，指定仁济医馆为其施种局。

1878年正月二十八日，医馆赞医生(James Johnston)邀请居沪西绅商在医馆开会，报告1877年仁济医馆工作情况，该年在城里种痘人数3833，在城外种痘人数5000，赞医生转告西人“施种牛痘，华人深信其有益故”。

面向社会免费施种牛痘，在19世纪的中国，并不只是由教会医院或西式医院单独承担的社会责任，担当这份社会道义的往往是西式医院中的中国医生和中国的地方绅士。仁济医馆因有黄春甫而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出色，既能服务于上海道台，又服从英租界的示谕。

仁济医馆最常见的病人是鸦片患者。1872年“来馆有服生鸦片烟求救者共四十四人，救活者三十四人，不及救治者十人”，有些人吞鸦片自杀，被送至仁济医馆“因不信西医不肯用西药，乃不治”。1875年黄春甫救治由巡捕房送来的鸦片自杀病人。《海上花列传》里有同样的故事：阿珠吞食鸦片自杀，妓院“唤个相帮，速往仁济医馆讨取药水”，因为“仁济医馆有西医急救之方”。媒体评论道：“沪上救治吞服生烟之

法，当推仁济医馆为第一。”

自19世纪80年代起，英国在华传教士深以为英国由印度输入鸦片，是流毒中国，违背国际公法，以此为耻，设会讨论劝阻英国政府禁止鸦片输入中国。仁济医馆在医治抢救鸦片病人之际，亦思考如何与中国官员合作禁烟，郑观应之“禁烟”一文即谈到：“仁济医院总理慕维廉到招商局与余一谈，问有无良策。”

仁济医馆是上海第一家西式医院，大病房之医院的概念、医生的诊断方法、治疗手段，以及所使用的仪器，都会引发市民好奇和媒体关注。但是仁济医馆在建立医院的社会责任、处理医生与患者关系方面所表现的特色，却超越了市民的印象。每年夏秋之际都是霍乱肆虐的危险时期，感染的病人死亡率极大。常人恐避之不及，上海居然会有一家医院主动登报请求重症传染病者来院治疗，态度诚恳恳切。1886年9月11日，仁济医馆黄春甫致信《申报》：

目前吊脚痧伤人殊甚，日有死亡。如有此症，务将病人赶紧送至敝医馆医治，或可挽回。不拘何时，均可送来，无不归收养，为救治也。

1888年8月9日，《申报》“仁济医馆来信”：

霍乱之症，每起于夏秋之际，医治稍缓，势必无救，甚可悯也。现悉本埠业已起是症，敝馆向有灵妙药饵，历年以来试之甚效，危而转安者，质属甚众，故用敢自信。如患此当事者，不论何时，宜速送来医治，毋犹豫不决，以致自误，况敝馆为救治起见，凡来就，不取分文，实可谅。并新闻报诸君，更相传布是幸。

1891年8月1日仁济医馆再次在《申报》发公告：

沪上痧症盛于夏秋炎间，其名不一，惟霍乱吐泻一症为最险，医治稍缓即成不救。往岁曾经登

报，有患斯症者即送本馆施救。如病家不愿送而请往治，独不知斯症用药既非一味，本馆势不能尽数移往即服药，时刻亦不容稍有差错，或增或减必须察看病象，然后施治，若仅给药，教令依法服治，无论其法未便谬执。且有病之家人，心惶急断，不能如本馆之留心，察看从容施救。设有错误，转致贻害。此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是也。如其送馆医治，不敢谓自有起死回生之力，但吾尽心，未必十无一得，每有不愿送馆，卒至不救者。闻殊惻然不揣冒昧再登报，奉劝如有患此症者，无论深夜速将病人送馆，无不竭尽心力，代为医治，分文不取，切勿犹豫自误，并望阅报诸君，互相传播为辛辛——上海麦家圈仁济医馆启。

仁济医馆劝请市民来医院治疗霍乱的广告一年大似一年，语气愈年诚恳急切，由最初的不取分文，到1891年的恳求奉劝，甚至表明“如有患此症者，无论深夜速将病人送馆，无不竭尽心力”，还希望“阅报诸君，互相传播为辛辛”。

仁济医馆由种牛痘、禁烟宣传到霍乱广告，无一不是动用社会力量和媒体资源，让医学信息越出医院狭隘封闭的空间，投射到社会，让医学和公共卫生意识渗透到民间普遍人家。医生走向病人，走向公众，这样便构建起一种新型而近代的医患关系：医生-社会-病人的关系。

医院如何募款：诠释近代行善价值观

医院募捐的成功与否，表面上反映的是该医院在社会的美誉度，实际上受到医患关系之制约，良好的医患关系是医院正常运行和维持发展的保障。

最早在中文媒体上出现仁济医馆的报道是在1869年的《上海新报》，题为“仁济医院帮助施医”。《申报》发刊之前，仁济医馆呈现在媒体前的形象，更多的是“施医院”——一所行善施医的场所。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赢得社会的关注，募集到更多钱款。因此，仁济医馆在教会媒体上刊登的均为其医院的就诊报告和获得捐款，并表彰捐款士绅。这样高调的自我表扬方式与传统中国人的习俗相违背、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相去甚远。

1870年《教会新报》报道，仁济医馆共收到捐银共“一千一百四十四两五钱五分”，另收取赠银“三百四十三两六钱四分，共计医治病人12250人。院中之中国医生向时岁修二百四十元，已历十八年既久”。此外还有外国洋行独立捐赠“其慷慨乐善或钦之至”。1871年、1872年、1876年《教会新报》多次公布医院收到捐款款数和捐赠洋行及个人名录，报告收治病人及治愈和未获救的人数清单，尤其强调医馆在城中牛痘局为儿童免费施种牛痘，获得官府信任赞许，以此培养社会公众对医院乐善好施的认知，激发华人捐资发展医院的意识，招募地方绅士和华商加入捐款行列。

1872年起，仁济医馆拟定改造医院创建新馆的计划，公开募集资金。仁济医馆的每份《医院报告》都是在教育华人、华商如何行善，考虑着如何让各界人士主动地从口袋里掏出银子来。

1872年10月，仁济医馆在《申报》付资刊登谢告，向市民诠释什么是善举：

且世間善事頗多行善之人，亦復不少，惟人之行善其居心各有不同，有以行善而看炫財富者，亦有行善而圖博美名者，且有行善而心存望報者，是皆行善而求